

从李光耀到李显龙： 新加坡对华外交策略的变化与困局

戴 石 顾纯磊

内容提要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逐步崛起并逐步成为亚洲强国与世界区域性强国,美国一家主导下的全球外交格局与势力版图不断变化,全球外交逐渐出现大国小国、东西方文明的多元竞争与非零和博弈。伴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对于领土、领海、台湾问题等主权诉求趋于强硬。新加坡是东盟的主要创始国,作为东南亚最有外交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其一直保持着实用主义均势策略的外交策略,寻求在中、美、印、俄等国中寻找外交平衡点。随着2011年李光耀彻底退出新加坡政治舞台,李显龙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新加坡在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上出现冒险主义与机会主义特点,“西进”特点突出,无原则亲美立场上不断提升,有打破不结盟原则与放弃外交平衡策略的倾向。新加坡的反共反华迹象有所抬头,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直接对抗是不明智也是非常危险的。新加坡不但应该回归到李光耀时代的实用主义均势外交策略中来,还应正视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做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的润滑剂与助力器,而不是做美国反华策略的前锋队,成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棋子,并承担美国外交策略失败带来的全部后果。

关键词 新加坡 对华关系 变化 困局

戴 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 210093

顾纯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助理研究员 210004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7.02.019

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全国面积约714.3平方公里(2013年),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总人口约540万(2013年),华人占75%左右,其余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新加坡古称淡马锡,8世纪属室利佛逝王朝,18-19世纪是马来柔佛王国的一部分。1824年,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在远东的转口贸易商埠和在东南亚的主要军事基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殖民统治,次年划为直属殖民地。1959年实现自治,成为自治邦,英保留国防、外交、修改宪法、宣布紧急状态等权力。1963年9月16日与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同年

9月成为联合国成员国,10月加入英联邦^[1]。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2]。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道,柔佛海峡、新加坡海峡,是东南亚的海空交通枢纽。它东西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南北连接亚洲和大洋洲,是亚欧非澳的交通要道,有“远东十字路口”和“东方直布罗陀海峡”的美誉。由此可见新加坡的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新加坡就是繁荣的港埠,尤其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大大的缩短了亚欧之间的航程,新加坡作为贸易的中转站,地位越来越重要,独立之后的转口贸易为以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资金基础。新加坡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对华外交(1976-2011)

李光耀,1923年生,2015年去世,享年91岁,被誉为新加坡的国父,是新加坡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其对新加坡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且巨大的。李光耀作为政治强人,带有典型的强权政治人物性格,其前期利用“马共”组建人民行动党,后组建自治政府并取得控制权,主导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并在加入联邦后清洗党内“马共”高层,掌握人民行动党绝对话语权。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其逐步将重心放在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事务上,通过华人平权运动,挑战执政党“巫统”,失败后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组建新加坡共和国,并与1965年正式成为首任总理。对于李光耀的生评,因与本文选题无关故不做评述。

从1965年建国到2011年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外交带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采用均势平衡战略确保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有学者(毕世鸿编《新加坡概论》)将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归结为主权至上、实用主义、和平共荣、积极外交四个特点。其在大国之间持中立、不结盟立场,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求与各大国的良好互动,并通过优先发展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建立地区间的和平与合作^[3]。新加坡早期以旗帜鲜明地反共反华融入东南亚诸国与西方外交圈,不断发展与中国台湾省的互利关系,相互取暖、相互需要、相互利用。随着中新两国逐渐开始接触,其在80年代逐步成为保持中国大陆与台湾省沟通的重要渠道。其与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用李光耀本人的话概括就是,“我们需要尽量多的朋友,尽量少的敌对的或者不友好的国家”^[4],这句话也成为指导新加坡对华外交的总纲领。

70年代中后期,新加坡基本解决了立国的问题,并在东南亚国家中逐步有了立足之地,李光耀开始积极拓展对华外交,并于1976年成功访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其重申了自己的外交立场与不反华的态度,即“中国越是强大,中国同美苏的力量就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5]。正是基于欢迎中国崛起的务实态度,两国于1979年正式签署贸易协定,两国经济贸易开始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李光耀政府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并派出相关人员指导先行先试地区制定发展规划,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中新关系不断升温,并于1990年正式建交,新加坡成为当时我国学习社会治理与经济发

[1][2]新加坡国家概况,人民网,2015年11月2日,资料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02/c399743-27765500.html>。

[3]肖立国:《略论李光耀的外交战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4][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安徽大学外语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2页。

[5]李一平、刘文正:《论冷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不断升温,世界多极格局逐渐显现,新加坡在中美、两岸之间扮演的角色地位逐步下降,新加坡逐步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在政治外交舞台避免卷入大国冲突,与中国台湾省当局的合作采取提前报备策略,争取中方理解,最大程度的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

回顾李光耀时期的中新关系不难发现,李光耀对于中国崛起的判断是准确的,其亲西方的立场是鲜明的,但是其欢迎中国崛起的态度是真诚的。其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好更快的融入国际社会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并认为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未干预别国事务”^[1],欢迎中国崛起以平衡东南亚的势力版图,李光耀从早期担心共产主义输入,到后期对中国模式的认同度增加,并尽量减少美国这个“善意的强权”的政治影响,保持外交政策的相对独立。总的来说,李光耀时代的新中关系,完全遵循着实用主义外交策略,按照国家安全依靠美国、经济发展依靠中国的总体思路,务实推进双边关系,努力在大国博弈中寻找平衡点,不断维系强化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二、李显龙时代新加坡对华外交的特点及变化(2011-)

李显龙,1952年生,现年65岁,2004年担任新加坡总理,从李显龙的教育背景及从政履历我们不难发现,其成长于新加坡的繁荣时期,并且带有完全的西方教育背景,其对华人的身份认同要远低于李光耀。李光耀推崇东方道德价值观与孔孟之道,认为“儒学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有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发展”^[2]。李光耀不完全认可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所谓的民主宣传。从李显龙担任总理到李光耀2011年宣布辞去政府咨政,这7年的重大国家事务依然带有强烈的李光耀色彩,尤其在外交事务上,李光耀对国家事务的影响依然是存在且巨大的。但是伴随着2011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的强权威胁言论导致人民行动党虽然赢得了选举但是创下近年最低,引起李光耀的反思并将国家权力完全交与李显龙。因此笔者论述的李显龙的外交从2011年开始。

李显龙的时代是伴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的战略而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区域性强国。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美国的势力在亚洲不断萎缩,奥巴马在中东问题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决定实施重返亚洲战略,既是为了维护美国全球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响应盟国的需要。李显龙时代的新加坡已经没有了生存压力,新加坡已经是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贸易与服务中心,并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正是基于新加坡综合国力提升的自信,对比李氏父子的外交策略,我们不难发现李显龙对华外交策略上更加直接和草率,缺乏一定的柔性 with 妥协。在继承李光耀时代的亲美立场基础上,李显龙不断强化对美的同步协作关系,并有逐步成为美国盟国的趋势。

新加坡一直以来奉行现实主义均势外交策略,在重大外交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是李显龙时代的新加坡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反复发出错误信号,不顾中国的反对与警告,在外交事务上选边站,有干涉中国内政的趋势。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贸易与服务中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区域性强国正面碰撞,只能说明李显龙政府对待外交问题的草率与鲁莽。新中关系的发展,就目前两国实力来说,中国对新加坡的技术与外资需求相对中国整体的国民经济来说权重并不是很大,而新加坡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权稳定离不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与世界大国,新加坡采取挟制中国快速崛起并与美日一道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外交策略是不明智的。

[1]陈岳、陈翠华:《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2]韦红:《新加坡精神》,〔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总的来说,回顾2011年至今新中发展的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从经济发展层面看,新加坡对华经贸合作稳步提升,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科技、教育、人文、环境等多元合作不断推进与深入,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在继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后又开始了重庆合作示范项目,中新合作前景广阔且发展顺利。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李显龙时代的新加坡对华外交不确定因素增加,双方摩擦可能性增大,新加坡在处理其与中国重大关切事项上过于草率,对中国内政错误发声,充当美日的发言人,是南海问题、台海问题的“活跃分子”,外交领域的冒险与机会主义抬头,并呈现出美新结盟倾向与反共反华意图。

三、打破实用主义均势策略后新加坡“西进”外交的困局

近年来,伴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新加坡这一美国传统友邦^[1],在美国针对亚太地区的各项政策上快速响应并保持高度一致,由“亲美”变“美盟”趋势明显。2012年,新加坡同意美国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2]。2013年,新加坡表示认同国际仲裁解决争端国的领土争议问题。同年,李显龙访美表示欢迎美国重返亚太,并力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实施。2015年新加坡公开表示“区域外国家有权对南海问题发声”^[3],持续为美日撑腰。通过近些年来新加坡针对中国重大关切的反应来看,新加坡存在定位偏差,错误的高估了自身的经济、外交实力,并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影响评估不足,低估了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随着中国全球影响不断加大,新加坡采取了更加快速的“西进”外交策略,即:进一步强化美新协作关系,充当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带头人与操作员。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濒临破产,作为亚洲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连续推销5年,只有11个成员国,并且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命令,正式退出TPP,实际上TPP已经宣告“流产”。这一由新加坡作为创始成员单位并极力在东盟内部推销的协定失败,为李显龙政府“西进”外交策略敲响了警钟,也凸显了其对外交的困局。

新加坡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过于冒进,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对于没有任何军事缓冲腹地且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新加坡来说,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的不谨慎与越界,必然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当今世界,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G20峰会的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峰会的定期召开、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发展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强大的中国已经展现雏形,一个互惠共荣的朋友圈即将形成。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华人国家,此时“两只脚”完全退出中国朋友圈是极其不明智的。实用主义的均势外交策略是新加坡成为一个外交大国的重要原因,经济高度发展是新加坡政治稳定、地位突出的核心基础。均势外交策略更多的是在大国博弈中寻找平衡点和外交立足点,并不是积极介入大国博弈。李显龙所推行的这种“西进”外交策略,是目前东南亚国家中所不多见的。新加坡需要的是一个繁荣发展、政治稳定的亚洲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全球霸主地位与在亚洲的主导权,目的的不同必定带来结果的不同。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亚洲格局中,美国想继续一家独大的局面是不可能维持的。

种种迹象表明,李显龙的外交带有明显的投机主义与冒进主义特点,过分高估了自己对东盟和中国的影响,介入原本与己无关的国家利益之争中,反复为美日站台,挑战中国底线,过分的消耗了李光耀时期缔造的中新之间的政治联系与经贸合作基础。新加坡需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中美关系,需要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亚洲势力版图,需要的是一个经贸合作频繁、开放共赢的中新关系。持续的“西进”外交会逐步丧失中国对其的信任,如果量变引起质变的话,在与马来与印尼周边国家关系摩擦持续增加

[1]因新加坡与美国并不是盟国关系,但是实际上新加坡是美国提供军事保障国家。

[2]赵泽琳:《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弹性外交策略》,《广州》《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3期。

[3]Albert Wa, “South China Sea should not overshadow ASEAN discussions: Shanmugam”, Today, August 3, 2015.

的情况下,中新之间关系恶化,势必对新加坡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新加坡虽然在人均收入、GDP等方面均处于上游水平,但是其主要依靠转口贸易支持经济发展的模式相对脆弱,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一旦出现经济持续下滑、国民福利降低,新加坡的繁荣景象将不复存在。如果新加坡在经济上持续衰退,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问题会被翻出。美国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也许会选边站,但是如果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之间发生军事外交冲突的话,也许新加坡这个华人国家的未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新加坡的主要危险来自于经济发展停滞、外交政策持续失误、周边国家军事冲突、政治传承出现动荡四个方面,而对华关系这个选题是需要耳顺之年的李显龙充分考虑的,不管是经济战还是外交战,这种负面效应是新加坡所承受不了的,新加坡这个屹立在马来人中的东方明珠,如果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下滑所带来的政治体制冲击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的不稳定,势必让马来人虎视眈眈。“西进”外交策略可以说是李显龙政府这几年外交策略最大的败笔,也会逐步令新加坡失去在东南亚国家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目前的东南亚格局,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是美国争取的对象,如果新加坡放弃自己的外交原则,变相的认为自己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代言人,势必会受到来自中、俄、印等大国的外交、军事、经济挤压。

李显龙政府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今世界伴随着新兴市场的发展,中、俄、印三国已经逐渐成为东南亚国家势力版图的主导力量,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需求程度,不管是从经济还是军事来说都严重下降。但是李显龙政府的外交手腕似乎还不如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不够谋定而后动,过于激进与活跃,不符合李光耀“减少每一个敌人”的灵活外交策略。对于新加坡这个与中国没有领海纷争且没有历史旧帐的国家来说,过度的活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新加坡这个小国所承受不起的。李显龙应该深入分析目前外交政策中的短板与缺失,通过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增加政治交流与互信,在中美关系中寻找协同发展的空间,做中美分歧的协调人,做中美合作的助推器,做中美两国的共同朋友,只有这样新加坡这个“东方以色列”才会走出大国博弈的外交困局,实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新跨越。

四、结论与建议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军事力量近些年来虽然高速发展,但还不足以平衡印尼与马来的军事威胁,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多变,新加坡要在东南亚国家中持续处于领导地位,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成为东南亚经济转型的“引擎”,持续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与服务贸易中心的地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目前的极高支持率主要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为国民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经济高速发展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先决条件,因此李显龙政府应该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对华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可以说,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早期是一个极度依靠西方干预,通过反共反华策略获得英国、美国的军事保障的“船票”,并以此形成立国保障。后期其对东西方的有效接触,实现了各方为我所用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受到了各国学者、政要的高度评价。李光耀时代后期已打消因共产主义输出导致李氏政府倒台的顾虑,其积极推进中新经贸合作。最大程度的减轻因新加坡与中国台湾省的经济军事合作对中新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相比而言,李显龙的亲美立场与李光耀时代相比更加突出,李显龙政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代,中美之间的合作要远远大于分歧,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一场非零和博弈。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两国综合国力的不断缩小,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上必然是携手相向的“好朋友”。

李光耀时代的外交策略无疑是符合其所在时代的,但是李显龙如果不跳出原本对华外交的思路与圈子,将会逐步由沟通的“桥梁”变成“两面派”,“桥梁”的作用如果彻底不在的话,新加坡将会逐步

成为东南亚各国眼中一颗“碍眼”的沙子。可以想象一个依靠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型集权国家，在经济崩盘的情况下的国家处境。因此，对于进一步发展中新关系，本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1. 增加执政自信，彻底放弃对华的外交敌视政策 新时期下，新加坡华人国家身份将由建国初期的劣势逐步变成新加坡的最大优势。2015年习近平主席专程访问新加坡，表达了中国对新加坡的友好与合作愿景，提出了“旨在加强中新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拓展人文交流，打造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1]。这对下一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新加坡走出外交困局开出了一剂“良方”。中国社会普遍对新加坡这个华人国家存在好感与身份认同，新加坡具备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双边友谊的基础，李显龙当局应彻底放弃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增加对自身执政能力的自信，团结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华人身份优势，增加国民中文教育，拓展政治互信，让新加坡成为一个璀璨耀眼的“东方明珠”。

从历史进程上来看，新加坡经历了从建国初期寻求英国军事庇护到现在的寻求美国对其军事庇护。正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庇护，新加坡在马来人中得以生存并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的“以色列”。目前，新加坡政治体制已趋于稳定，没有了80年代以前的国家存在担忧，人民行动党支持率高居不下，政府廉洁程度高，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环境优美，人文教育发展态势良好。新加坡应该彻底走出对意识形态的恐惧心理，回归到理性的独立外交中来，务实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在中美之间寻找契合点，为增强中美互信创造有利条件。

新加坡是华人国家，立国时的反共反华纲领与李光耀的政治选择有关，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苏、美对抗格局下的现实需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建交，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复兴，亚洲版图在不经意之间由原本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变成现在的全球大国博弈。中美建交以后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并伴随着双方的深度合作，存在摩擦与分歧会越来越少。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合作机会要远远大于挑战与摩擦，世界爆发全球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互助、互惠、互利、共享发展成果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新加坡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一直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伙伴，伴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健康化与积极化，新加坡应该适度调整自我的外交策略，真正融入到中国的朋友圈中来，在中美的共同朋友圈中寻找交汇点，彻底放弃对华的外交敌视政策，将不符合当今国际发展趋势的反共的论述从政治纲领中删除，努力做中美两国的共同朋友。

2. 扩大对华贸易合作，强化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对于任何国家，经济都是国家内政与外交的重要支撑与后盾。没有经济的发展，任何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构想都是空谈。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型国家更是如此。保障新加坡独立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2]。新加坡之所以是现在的新加坡，主要是得益于全球一体化进程，正是全球经贸的快速发展，让新加坡保持了经济的高度发展。东南亚国家相对稳定的局势，也为新加坡创造了和平发展的空间。新加坡经济的高度发展带来国家储备的持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实现了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

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受惠国与既得利益者，在这个大背景下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有损新加坡国家利益的。这既不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也有损东盟国家的利益，既是对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破坏也是制约中国崛起的手段。正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下，全球贸易得以

[1]林卫光、蒋天：《习主席访问新加坡有三项重要内容》，[北京]《中国青年报》，2015年11月04日第7版。

[2]刘少华：《论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北京]《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迅猛发展,各国共享全球经济硕果。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东南亚最大的贸易服务中心,在国际市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参与的经贸协定中,新加坡首先参与并极力游说是不理智且不负责任的。

近年来,新加坡在科技、机械、电子、人文等诸多领域发展迅猛,且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升。现在中国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经济上依靠中国已经是新加坡发展不争的事实。因此,新加坡应该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强化双边贸易合作,拓展经济合作新领域,彻底放弃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推动,并在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发挥力量。应在不断巩固和拓展原有合作项目与平台的基础上,加大对中国的技术、资本、服务的输出,在更多的领域开展双边合作,既让新加坡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也让中国加快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产业升级,只有通过不断的高效、务实合作,发现经济贸易中的新增长点,真正让中新两国共享双边合作成果,互利共赢,携手共进。

3. 拓展多元外交,寻求大国博弈中新平衡点 从历史发展进程中看,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反共反华立场更多的是国家生存的需要,尤其在两个主要邻国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持反华的立场下,新加坡还需要依靠英美军事保障,是不可能采取亲华立场的。但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中、俄、印将是未来亚洲外交、军事、经济版图的主力军,美国在亚洲势力的衰退不可避免。从60年代反华反华的求生存到90年代开展积极务实的友好外交关系,新加坡逐步探索出一条积极务实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小国大外交的格局逐渐形成。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21世纪以来,中、俄、印等大国逐渐复苏,世界由美国一元主宰逐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与多个区域性大国之间相互影响的世界格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衰退不可避免,对于新加坡来说,必须接受美国力量衰退与中国力量觉醒的事实。新加坡要清楚的认识美国已经并不是维系东南亚均势的关键所在,要维持新加坡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外交格局中的“大外交”地位,与中国的良好互动与密切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不难发现,中国在东南亚诸国的传统友好伙伴正是在中国的经济辐射下呈现繁荣发展态势的。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供给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军事深化改革正在不断完成,我国逐渐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由大国步入了强国的快车道。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不断释放,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国将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国家安全、海外资产权利与侨民安全,也必将采取多种手段维护自身的历史、合法权利。新加坡,作为奉行实用主义与均势策略的外交大国,应该更加主动、积极、真诚的欢迎中国的大国崛起,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切勿盲目发声,挑战中国底线。应不断强化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军事强国的经济、外交、军事、人文、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切实找到新时期下大国博弈中的平衡点,起到中美关系的“润滑剂”与“助力器”作用,真正成为中美两国共同的朋友。

[责任编辑:史拴拴]